

东方说唱艺术系列丛书

韩起祥评传

胡孟祥著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献给建国四十周年

韩起祥评传

胡孟祥著

中国民

一九八九年九月·北京

东方说唱艺术系列丛书
韩起祥评传
胡孟祥 著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单太仆寺街 39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潍坊市计算机公司激光排版

实验印刷厂排版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frac{3}{8}$ 字数:20 万

1989 年 9 月第一版 198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500 册

ISBN 7-5010-0252-6/I·252 定价 5.00 元

《东方说唱艺术系列丛书》

编 委 会

特约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希坚 王朝闻 关德栋 李庄
吴晓铃 金紫光 苗培时

名誉主编

高占祥

主 编

胡孟祥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卢昌五 李万鹏 李希凡 汪景寿
杨亮才 罗 扬 周建基 赵亦吾
常祥霖 薛宝琨 戴宏森

全国间书画家协会
书画作品展

一代英豪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习仲勋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习仲勋同志为《韩起祥评传》题词



1987年春作者与韩起祥在一起

《东方说唱艺术系列丛书》

编 辑 说 明

一、本丛书重点编辑出版我国当代说唱艺术理论家的研究专著和说唱文学家作品专集，同时兼顾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尚还健在的我国著名说唱艺术家、文学家的传记文学，对于有一定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传统书目，本丛书作为参考研究资料也在编辑之列。

二、丛书力求比较全面地搜集、整理我国解放区说唱文学史上有代表性的说唱文学家的作品资料，真实地反映作家和作品的历史本来面貌。注意不同风格、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品和文章。

三、丛书第一辑编选的书目，集次如下：

《韩起祥评传》、《何迟自传》、《李凤琪说唱文学集》、《周喜俊说唱戏曲集》、《薛宝琨说唱艺术论集》、《胡孟祥说唱艺术论集》、《戴宏森说唱艺术新论》、《孙书筠京韵大鼓演唱集》、《解放区说唱文学作品选》(上、中、下)、

《解放区说唱文学资料选编》、《解放区说唱文学史》。

四、本丛书在编选过程中，得到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图书馆、山东图书馆、山西档案馆、瑞金革命博物馆、延安革命博物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为本丛书的编辑出版提供了条件。在此一并致谢。

五、在庆祝建国四十周年前夕，本丛书编委会集中一定人力加紧编纂，旨在向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献礼。由于时间、人力和水平所限，丛书可能存在不少失误，热诚希望读者给予指正。

《东方说唱艺术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1989年2月1日

论说唱艺术的价值观

——《东方说唱艺术系列丛书》总序

高占祥

中国说唱艺术是中华民族民间艺术的瑰宝,如果从说唱艺术繁盛时期的宋代算起,至少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中国的说唱艺术适应并培养着广大民众的审美心理和欣赏习惯,影响并哺育着众多民族艺术的形成和发展。我国的戏曲艺术能以自己独特的形态卓立于世界戏曲艺术之林,究其原因,主要是受说唱艺术的影响。我国戏曲不独表现在音乐的本色上和题材的大众化上,而且表现在以“观众为中心”的艺术观念、与观众达成默契所产生的虚拟写意的艺术体系、戏剧冲突的单纯倾向以及时空关系的自由转换上,乃至戏曲语言的诗化体式等诸方面。中国小说的民族形式的形成,直接导源于“说话”,“讲史”哺育了中国小说的长篇章回体裁。关于中国叙事诗的形成和发展时有阙疑,说法不一,照我看来,我国的

叙事诗是相当发展的，有些叙事诗受到说唱艺术的影响，登上了舞台，“说唱化”了。中国的说书唱曲是再现与表现相结合，写实与写意并重，潜心于意境之再造。

我国的说唱艺术，自变文、诸宫调、子弟书，直至现代流行的各种鼓曲，借事以抒情，因情而叙事，此乃唱曲者唱情也。正由于说唱艺术独具风彩，故始终拥有自己的观众，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

由于传统的偏见，以及诸多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不但长期历史锻铸的传统精品发掘整理得不够，说唱艺术的理论研究也很薄弱，与戏曲、小说诸艺术门类相比，显得很不协调。因此，出版“东方说唱艺术系列丛书”，以东方艺术为广阔背景，从宏观系统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探索其艺术奥秘，是一件具有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事情，既有利于促进我国说唱艺术的发展，也有助于中国的说唱艺术走向世界。

预祝“丛书”编辑出版成功。

1989年3月27日于北京

(载1985年5月20日《文艺报》)

史才与诗笔的结合

——《韩起祥评传》序言

薛宝琨

《韩起祥评传》，不是当今流行的靠子虚乌有地杜撰、假借通俗小说名义而为刺激一般读者猎奇性的那种“传奇”；也不是在“民间文学”的美名下，采撷“奇闻”粘结“轶事”，把传统的欣赏心理和历史感情灌注于理想化了的人物，具有传统性质的“传奇”。而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按照文学和史学的眼光，采取“史才和诗笔”结合的方法，通过辗转千里的实地调查，以及与人物本身的朝夕共处，把纪实性的材料和作者本人的体悟交揉一起，“实者虚之，虚者实之”，把人物放在开阔的历史环境和背景下观照，又极力把握人物自身性格的生动性而浑写成篇的。简言之，《韩起祥评传》的魅力，靠的是韩起祥一生经历的真实性、生动性，以及由此而生的传奇性的“评传”。

一个盲艺人成了一位艺术家，由啥字不识而长篇巨

制，由流落街头而声扬遐迩，由看不见、摸不到周围的一切而感得出、悟得透时代的烟云、社会的风雨，从而以他一条并不响亮的嗓子和一把并不精致的三弦，唱出了时代和人民的心声，这其中经历了怎样艰难曲折的过程！“时代造英雄”和“英雄造时世”，在韩起祥身上得到了辩证地统一。他的冷热沉浮，概括了人生的幻灭与追求、奉献与索取、失败与成功、偶然与必然、命运与机遇等等富有哲理性的经验。

“四人帮”被打倒以后，蜷曲的文学和艺术开始伸展了它们的躯体和触角，但是，这只迷失了现实也迷失了自我的小鸟，刚刚贴近生活的地平线，受伤的翅膀又促使它们迅速起飞钻向云端了。“纯文学”和“俗文学”各呈其态，其中不少“纯而又纯”的雅儒，在“淡化政治，淡化生活，淡化情节”之后，也淡化了自我和文学与人民群众生活的密切联系。而所谓“通俗小说”，也多在超现实神鬼世界和异国风情里驰骋，因袭的题材和套式，把传奇性凌驾于现实之上，其实也如有的“纯文学”一样，躲进了“自我表现”的套子里。于是，当刺激复归于麻木之后，一般读者还是喜欢实实在在的东西。传记文学大概就由于它的纪实性而穿越时代，不仅为当代读者提供翔实的生活阅历和历史趣味，而且为后世印下了深刻而有启迪意义的历史足迹。正是由于这些，我赞赏《韩起祥评传》的出版，赞赏富有传统的我国史传文学的复归和振兴。

1988年元月于南开大学四文斋

为人民艺术家立传

——贺敬之谈著名曲艺家韩起祥

在撰写《韩起祥评传》的过程中，笔者曾拜访了原中宣部副部长、我国著名诗人贺敬之同志。贺敬之同志是最早发现韩起祥同志的新文艺工作者，是他四十五年前把这位民间说书艺人领进了解放区最高的艺术学府——鲁迅艺术学院去演唱，从此，韩起祥同志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陕甘宁边区无与伦比的“说书英雄”。回忆这段历史，贺敬之同志满怀深情地讲述了他与韩起祥同志的交往和友谊。

贺敬之同志介绍说：我结识韩起祥有个历史背景。1942年5月间，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同志作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大约在1943年春，延安文艺工作者为实践《讲话》精神，很快掀起了一个新秧歌运动。首先是“鲁艺”的秧歌队，以王大化等同志为代表，率先编演了《拥军花鼓》等许多秧歌节目和

秧歌剧《兄妹开荒》。一开始我就参加了秧歌节目和秧歌剧的创作。记得1943年冬至1944年春，我随“鲁艺工作团”到绥德、米脂、吴堡、子洲等城乡去深入生活，其间，我与王大化、张水华、马可等集体创作了中型歌剧《周子山》。该剧在延安文艺运动史上占有一定位置。在创作小型秧歌剧和中型歌剧的基础上，才开始创作《白毛女》的。这年10月间，我参加了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会上，马健翎被授予特级英雄，王大化被授予甲级英雄，我和其他一些同志被授予乙级英雄。

大约在1944年的夏秋之交，我到延安县政府的驻地王家屯去深入生活。当时我做了三件事，一是了解陕甘宁边区开展的“十一”运动（即：开展经济建设、文化建设要兴办“十个一”的运动），一是了解破除迷信、改造民间巫神、巫婆的情况，再一个就是收集延安地区的民歌。这次下乡我有两个收获：一是结识了童养媳李桂芳，她会唱许多“信天游”，并且是自编自唱。我把她唱的民歌记录下来，何其芳编的《陕北民歌选》，其中一部分就是李桂芳编演的。1964年柯岩病了，我抄了一段话，激励她好好养病，其中有两句：“长腿鹭鸶沙梁上站，有朝一日我走大川”的词，就是李桂芳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创作，这次给我唱的，她唱得很动情。

另一个收获，就是结识了韩起祥。当时延安县委的同志告诉我说，他们收容了一群算命先生，中间有一个人，是从横山那边来的，他不是一般的先生，主要是说书

艺人，还能说几段自编的新书。这个人对边区政府、对党、对毛主席很有感情。听完了介绍，我就去找这位说书先生，他，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韩起祥。我们见面后，韩起祥给我讲了他的经历，我听了很受感动。他又给我唱了一段他自编的新书，很有艺术光采，我把它记录了下来。我当时觉得民间艺人说新书，是很值得重视的现象，是一条值得提倡的正路子。于是，我就把他从延安县政府所在地领到“鲁艺”去。途中，我对韩起祥说：“你知道‘鲁艺’是咋回事吗？”他回答：“那我知道，都是些有学问的人哩。边区老百姓都知道‘鲁艺’家的秧歌好着哩。”接着，我告诉他群众有一段秧歌词，是鼓励“鲁艺”同志的，我说“鲁艺”做得还很不够，还要继续努力。这段歌词是：“诸位同志听我话，种花要种绿籽花，种谷要种狼尾巴，看秧歌要看‘鲁艺’家。”我说：“‘鲁艺’的新秧歌是从旧秧歌发展而来的，你的旧说书也能变成新说书。”

来到了“鲁艺”，我把起祥介绍给戏剧系的张庚，音乐系的吕骥、马可、安波等同志，当时教务处接待了他，请他说书，他至少在“鲁艺”说过两次书。起祥演唱起来满怀激情，开始总是把“鲁艺”和我唱进去，我现在回想起来心情仍然很激动。韩起祥从一个普通的民间艺人，走向了新文艺队伍，成了一个方面的代表性人物。一个说新书的很有发展前途的说唱演员，总不能老过流浪生活，怎么办呢？这样就参加了陕甘宁边区文协说书组。后来，韩起祥又到“鲁艺”说过新书，我记得日本投降前，他

还把新上演不久的歌剧《白毛女》编成了新书演唱，也到“鲁艺”演唱过。解放战争时期，我离开了延安，听说这一段韩起祥有许多动人的事迹。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又有些交往，我两次回延安，都去看过他，一次是1956年，一次是1982年。他每次到京开会，也都来看我。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先后调文化部、中宣部工作，对他的工作条件、筹建曲艺馆等问题，我与陕西省委、延安地委的同志一起，都给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他对我，我对他，可以说是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意。

关于《韩起祥评传》一书的写作，我谈几点感想：

一、对韩起祥的评价，我没什么意见，你在《历史的功绩》一节中都谈到了。我觉得如果写得引人入胜，最好分析他的说书艺术。为什么他的演唱受人喜爱呢？除了政治意义之外，里边还有艺术。对于他的演唱，我是很倾倒的，作为说唱艺术而论，他的声音、他的语言、他的创作都是很惊人的，表演也是第一流的。他演唱起来很有激情，该粗犷的粗犷，该细腻的细腻，人物刻划入微，是很动人的。他那么早就参加了革命，用自己所掌握的艺术，自觉地去为革命战争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并且发展了自己的说唱艺术，这是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文艺、社会主义的文艺。一个是曲艺独特的艺术形式，一个是民间艺人，不是大学毕业，留学国外，而是土生土长的社会主义文艺中一个方面的代表人物，应该给予应有的评

价。

二、这个人物选的是很对的。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新文艺与民间文艺，知识分子与民间艺人的相互关系，到底怎样处理好，韩起祥是个例子。专业的新文艺工作者对他是有帮助的，不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我们这些人也向他学习到很多东西，特别是对文艺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的理论和实践上对我们有很大启发。这不仅是对搞曲艺，搞其他艺术也是很有启发的。

三、过去，没有人给韩起祥作传，你们写了，希望多花点功夫，把它写好。

临别时，贺敬之同志题赠我八个字：“为人民艺术家立传”。

（胡孟祥整理，贺敬之同志审阅、修定，载 1988 年

1月30日《农民日报》）